

## 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

——怀念杨廷宝

童 寯

我和杨廷宝两次同学：先在北京清华，后又在美国费城。

1925年我在清华学校毕业，决定到美国进大学攻读建筑专业。那时听说毕业同学在美习建筑的有杨廷宝（1921年去美）我就给他写信询问专业情况与入学须知，他回了信，作为我们订交之始。

我到费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后，除常见杨廷宝之外，还和学建筑的清华同学梁思成、陈植往来，并和梁同寝室。陈、梁两人都认杨为畏友并视杨为师。杨当时已以优异成绩由大学毕业，在费城克芮（Paul Philippe Cret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教授 建筑事务所工作，并深受克芮古典主义影响。

1926年杨和赵深结伴经由欧洲回国 在天津暂停 立即被关颂声留下作为基泰工程司成员，负责建筑设计任务。这是杨加入基泰的开端，直到全国解放为止。

基泰业务由天津发展到南京、上海，从1934年起，杨因业务关系常到上海，一住便是几个月。上海建筑师熟人很多，但我和他作为两个北方人过从最密。我们两

人几乎每星期日见面，经常同游上海附近城镇，浏览古迹名胜，数次到甬直保圣寺看唐塑或游南翔古猗园。游了整天同回沪到我家吃晚饭。那段时期，他是我家常客。有时他也下厨房，用面条加鸡蛋煮成汤面，如此者不止一次，荆妻戏称这为“杨廷宝面”。晚饭后闲谈，我有时拿出买到的画册和旧书共同欣赏，荆妻说我又“献宝”了。那时每星期日都是快乐的日子。抗战时期，杨和我先后都到重庆，也时常见面，又在兼管建筑事务所以外，先后同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建筑系教课。抗战胜利后他一度是系主任。这样我们两人开始同时同地工作，直到他逝世为止。

杨廷宝不特有独到的设计才能，业务上廉洁公正，一丝不苟，为人更是品德高尚、文质彬彬的君子。作为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他的下世对我尤其是进入桑榆晚景的老境，打击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1983年1月15日书于北医病榻

# 一代宗师

——怀念杨廷宝老师

吴良镛

我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受业于先生，以后虽身处异地，但在一些会议、学术讨论或设计工作中，不时能与杨老晤面或共事，继续聆受教益，追溯往事，益增对先生缅怀崇敬之情。

业精于勤，老而不衰，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所得的第一个感受。我在中大读书时，即听到杨先生学习努力的传闻，同学们争相传阅国外的《建筑初步》教科书上刊登的杨先生学生时代的作品。后来林徽因先生也和我谈到他在国外敦品力学，几乎得到所有教师器重的情况。正因如此，他不仅直接受教于名师 P. Cret 门下，并广泛得到师承。如果这些至今印象很深的赞语还毕竟是传闻的话，感受更深的是我在先生身边的切身体会。兹举二、三事为例。50 年代初，我与杨老、梁思成先生等在北京东安市场某饭馆就餐，谈话间忽见杨先生从座位中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琢磨着面前的桌椅，随即从怀中掏出卷尺将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得甚为舒服，才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我与杨老在某大楼前等人，杨先生对大楼仔细观看，然后对我说：“你看这样分缝太马虎，好多地方没有交待，上部处理也没有交圈……。现在有些人搞设计很不注意这些，其实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要仔细推敲……。细部也来不得马虎，如果忽略了，功夫做不到家，就不经看。”只要对比杨老设计的建筑，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扩建部分，不仅总体很好，两期工程浑然一体，仿佛一气呵成，而且细部极为严谨，就更加理解杨老此话的涵义。1955 年我随杨老等参加国际建协第四届年会，顺访苏联，参观农业展览馆会场。一进场地，见到一巨大拱门，杨先生问我：“你注意到这门的尺度没有？如果没有靠近大门的人的对照，你未必能发现它的巨大。这么高大的建筑物，却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庄严效果。”我仔细推敲，果然如此，原因是周围缺少陪衬和尺度的对比，而拱门本身的细部处理也粗糙，是设计者将小图样等比例机械放大的后果。如不是杨先生的指点，我也就轻易放过了。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心得和血凝！”这种出于自己琢磨的学问，比一般书本知识更为珍贵。在做北京图书馆设计方案时，杨老已七十余高龄，完全可以自己不动手，至多作些小草图，指点共在一组的张镈、

戴念慈、黄远强和我这些学生辈画图就行了。但是杨老非常认真，从方案构思，平立剖面透视，整套草图亲自动手，表达得完完全全，并把工作日程安排得有计划，有条理，定时上下班，这样连续工作约一周按时交图。时值严冬，招待所暖气不好，他中午不回房间，饭后在太阳下走几圈就回绘图室伏案工作。而每次工作完毕，就把图纸压在丁字尺下，铅笔整齐排列，放在固定位置，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我们在他旁边，感受至深。

杨先生治学和工作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建筑设计，绘画，以至身体的锻炼无不如此。杨老师告我，他早年体弱多病，在清华读书时甚至不能上普通体育课，幸得有教师授以武术，从此，六十年持之以恒，毫不懈怠，故虽然老年，无论登山远行，尚能健步，这也是他得以旺盛的精力从事建筑事业的基础。近几年来，我不时请教他对某些工作的看法，他常叹息地对我说：“我如果再年轻十年，就不会这样。”壮士暮年，不仅志在千里，更是豪情满怀，直到生命的火焰最后熄灭。这种生命不止、进步不息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博学而守约，这是杨老治学的另一可贵特点。杨老在国外学习的青年时代，对西方古典建筑设计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和扎实的基本功。回国初期，开始建筑实践，并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整理与修缮，与当时从事古建筑研究者如朱桂莘、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交游，对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施工构造和造型作了深刻独到的研究。这样中西合璧，豁然贯通，为他后来的设计创作、民族风格的探索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这一点，杨老的许多建筑设计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我想再举一例，在 1977 年毛主席纪念堂第二次设计方案讨论会上，杨先生曾建议在纪念堂南北入口柱廊的台座前加“月台”，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如果采纳了南北加月台的建议，而东西两侧平台向心收缩一些，不仅会加强南北中轴线，使两侧的绿化庭院空间加大，并且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南北突出的平台更协调。后来我参观曲阜孔庙，更感到月台的气魄，又想起了杨先生的这个建议，愈敬佩前辈建筑师学识之深厚，见解之高超。杨老一生主持了近百幢建筑物的设计，这是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专集不久将出版，本文不多作叙述。解放

后杨先生继续致力于建筑设计或参加咨询工作，同时周游祖国和世界各地，这时他的视野逐渐从建筑设计扩大到城市规划。从苏联访问回来后，他对当时苏联建筑设计很少提及，实际上有所保留，但对建筑的整体性及首都莫斯科的气魄，非常赞赏。前年又访问了朝鲜，回来也赞赏平壤规划的完整和环境绿化的美丽。这些年来他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考虑得更多了。记得他有一次和几个人谈起，解放后如果北京城向东郊即向天津方向发展，西郊保存大片田园或林地，直至西山，既保存了清洁的水系，旧城保护也可以好些，当然现在是不现实了。十年浩劫，文物大量被破坏，他为此不断呼吁，惋惜地说：“每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不知道有多少文物在破坏。”“一些小城市以盖高楼而炫耀，费大力，不经济，不适用，也破坏了原有环境。”近年来杨老还致力于自然风景环境的保护工作。他对我说：“苏州、杭州的自然风光已经受到较多的摧残；我看中了武夷山是因为它没有经历人为的破坏，要保护好这山水环境。”……我觉得他的建筑里程，一步一个脚印；他的思想领域逐步更开阔，更高瞻远瞩，思索着更长远更重大的问题。当然杨老有他个人的经历和时代条件，有他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对他的毕生成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应当学习他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的需要，不断扩大、充实自己的思想和业务领域、不断前进的精神。

简练以为揣摩，这是杨老治学和立论的作风。杨先生是实际工作者，并无意做理论家，早年发表论述不多、曾以“宝何能为文”而自谦；但透过杨先生的实际工作，很能说明他的建筑观。到了后来，随着工作需要，自己也越来越重视阐述和探讨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了。现举北京和平宾馆的设计为例。尽管在这一时期建筑界一般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设计思潮，杨先生却能独立思考，而不趋势从流。和平宾馆的设计在用地苛刻的条件下，无论在利用单行线的交通组织、保留老树与水井的庭园设计方面，还是建筑空间的实用紧凑方面（特别是门厅的精心设计），都作了极为妥善独到的处理。此外，还对典型环境作了北京特有的点缀，例如在水井上安装了从古建筑废弃下来的汉白玉栏杆，以取得雕刻的效果；保留了前排民房，使之形成一个封闭幽静的庭院；民居前还

加了一间抱厦，作为大楼入口和休息厅南壁的对应。杨先生还告诉我，旅馆的大门口本来设计了一个北方的单间牌楼，可惜领导不喜欢，认为象个“断头台”而被砍掉，当时混凝土基座已打好，不得不加上两个灯成了现在的门墩。我想，如果按原样建造，无论从街景入口或从庭院对景来说，有较高的牌楼和抱厦互为呼应，轮廓线更要丰富些。和平宾馆的设计将实用功能放在第一位，更多地采用近代建筑设计技巧，造价也甚节省，结构系统简单，而建筑艺术处理，室内外空间丰富，造型简洁无华（在完成时竟曾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在此前提下于细致处见匠心，恰到好处地保持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四人帮”横行时代，面对当时建筑界的某些对民族建筑文化的近乎虚无主义的倾向，杨先生已不默默地伏案作图，他不仅用实际设计说明一切，而是挺身而出，坚定明确地提出要有民族风格的主张。例如在北京图书馆方案设计第一次评议会上，杨先生侃侃而谈，盛赞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气魄和建筑立体构图的完整性等，并以他的设计方案来说明自己的设计观点。杨先生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不作惊人之笔，更不卖弄玄虚，看似平凡，而说中要害。回想他多次对某些规划设计提意见，力求实际可行。至于好高骛远、空洞无物之语，杨先生每称之为“摇笔杆”，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

循循善诱，身教言教，这是作为教育家的杨老的本色。建筑教育是杨老后半生的主要事业。任何教师当然必须具有一定的学识和实践的经验这个基本条件，当然杨老学识更为渊博，经验更为丰富。但我觉得杨老还有他自己的教育风格。作为杨老的学生，我的第一个体会是严格要求。杨先生自己治学严谨，他首先要学生养成良好的设计工作习惯：搞方案，平、立、剖面图必须同时作，以便综合考虑问题，对没有这样作的学生甚至拒绝评图；对学生设计的评阅，都是挑在点子上，或使用上的不合理，或结构上工程上虽能勉强做出来，但施工复杂、浪费，或造型不美观。“你透视图画得很好，但是比例不准，盖出来不是你这样子”，“如果没有你图面上这棵大树，又会怎样？”等等，一语中的，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我的第二个体会是他极大地启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例如中国建筑的构造课是比较枯燥的，但杨先生任教，常结合自己在工程修缮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关键技术，穿插一些故事使同学们感到生动。使我至今印象甚深的是，某同学作荷塘水榭设计，衬景画坏了，荷塘色彩越涂越脏，正无计可施，那天晚上杨先生比较悠闲，嘱将颜色洗掉一些，他就在纸上留下的色泽上略施淡彩渲染，再用吸水纸吸出几道倒影，立刻清水芙蓉浮现纸上，仿佛荷香十里，生意盎然，同学们欣然称绝。这说明教师实践的经验 and 精湛的技巧是多么必要！我从杨老师身上的第三个体会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要能像修养极高领人在学海探幽的导游者，能打开学生心灵深处，使之仿佛进入蓬莱仙境，离奇景色，美不胜收，再由学生自己去识别、探求、采集、雕凿。这是教学的更高境界了。记得有一次杨先生带了若干幅北京的水彩写生悬挂在教室中，当时我并未到过古都北京，那明亮的白塔、低矮的北海南门古松（此松现已不复存在了）、色彩缤纷的辟雍琉璃拱门……我仿佛身临其境。而我在 1946 年初来古城，即对这些胜迹一一踏游，这一切又仿佛似曾相识，一画之魅力竟能如此！我又记得在某晚间，杨先生与学生谈旧中国建筑行业如何为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垄断的情况，而老一代的建筑师从西方留学回国后，通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打破洋人对新建筑设计的垄断，以自己精湛的业务水平，逐步在上海、天津、南京这些“码头”上立足！老师的一席话，激发学生的愤悱之情，事隔四十多年，此情景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这又是何种魔力在指使？

杨先生对建筑师的培养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

生毕业后，首先应当实践，会盖房子，从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有机会时，到国外游学，开阔眼界。他并不赞成毕业后立即当研究生，从书本到书本，钻进一个狭窄的天地里。“四人帮”垮台后，杨先生去美考察教育归来，我特地去宾馆拜访求教，他对西方建筑科学及教育的新发展从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他告诫我们：对外国有用的东西当然要学，但中国的建筑教育还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需要，不能随国外亦步亦趋。

前面所记只是个人受教于杨老的一些感受。可追忆的事情当然还很多，上述分析在理解方面亦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本文的目的不仅表达学生对逝者的怀念，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感到更有必要发掘杨先生的高尚品格，鞭策自己，启发后学。我认为我们对西方的建筑大师，特别是近代几大名师介绍很多，这是必要的。他们的支言片语，传闻轶事，在我们的青年学生中亦或比较熟悉。但对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赵深……这样的一代大师，对中国近代建筑事业有着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却不甚了了。过去虽有近代建筑史书，但对过去历史或失之过简，或否定者多；而十年浩劫，使文籍资料极多散失，思之怅然。死者已矣，趁硕果尚存更应及早求教，我们应多作梁思成研究，杨廷宝研究……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至在纷繁之事物中昏昏然，理不出一个脉络来。如这一工作做好了，前辈之成就当永远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 《杨廷宝建筑言论选集》序

吴良镛

这本书选编了一代宗师杨廷宝教授半个世纪以来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风景区建设与古建筑保护、建筑教育、建筑绘画等方面的言论。其中发表时代、背景、场合及表达方式虽不一，但作为整体，可以从中了解杨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并反映了这一个时代的许多建筑情况。

杨廷宝先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建筑事业，当然首先以建筑设计的贡献而闻名，这方面，已经有《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问世。作为建筑设计家的杨廷宝的步伐、历程是清晰可见的：从清华大学留美、接受美国巴黎美术学院体系教育，师承 Paul P. Cret，得到新古典主义的基础训练；从美国欧洲游学归国后，在从事建筑实践的同时，主持修缮北京古建筑，对中国古典建筑又打下了结实的根基；正是基于上述中西两方面的功力，嗣后在南京之建筑创作活动中，得以结合“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创造出一些优秀的纪念性建筑作品；抗日战争后，从事实践的同时，杨先生开始投身建筑教育，由于有了这一重大的转折点，解放后他转向以建筑教育为主，并随着社会需要，在业务上从建筑设计渐扩展及园林、风景与城市规划，并渐从实践扩向理论性的思考。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顺乎时代需要而前进，合乎逻辑地发展，水到渠成。50年代后，他周游国内外通都镇邑，名山大川，交游日广，思路、眼界亦益开阔。指出这一点在于说明杨先生思想的形成与学术根基之殷实。

杨先生本人无意为理论家，这位非理论家之理论是从实际出发，以供实践所用为目的的。由于杨先生为人处事，严肃认真，言语朴实无华，不作惊人之笔，然有其独到的见解与表达之特点。并且从论事出发，揭示平

凡之真理，颇中时弊。他不厌其烦地呼吁社会了解建筑事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要求建筑师树立全局观点，了解国情与重视节约，深入研究规划设计条件，精心设计，并强调近期规划作用，留有余地；对于建筑教育，要求青年加强全面修养，注意观察，独立思考，不为西方建筑杂志某些偏颇之见所左右等等。杨先生这些见解基于他广阔的阅历和良苦用心。

杨先生之言论，面向实际，在建筑实践中自然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我接触到的两件事为例，“文革”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为了新校舍选址，杨先生与我等应邀参加，会上提供选择的两个方案，都是从市区迁至近城郊，虽各有一定的根据，而杨先生从实际出发，独排众议，建议在原址上调整插建，最终被采纳。实践证明杨先生的意见最切合当时具体情况，也节省了国家资金，此事至今，我仍不时想起，感到教益甚深。又如北京图书馆设计，当“文革”后期，“大批判”之余，建筑界思想混乱，设计缩手缩脚，杨先生却鲜明地强调这类文化性建筑要有民族风格，并且力崇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气魄等。在杨先生的影响下，形成了五人小组，几经发展才产生今天的北京图书馆设计。以上所举，在于说明对杨先生言论所产生的实际积极作用，我们应予足够的认识。

我作为杨先生的学生，解放后又有各种机会聆其教诲，重温华篇，似言犹在耳，不胜亲切。杨先生晚年更负盛名，深感毕生奋斗之建筑事业任务之艰巨，偶尔亦流露寂寞之感，我理解为知之愈多，思之愈深，心中愈热，为之奔走愈繁，言之亦不厌其烦也。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整理文集毕，杨师母嘱写数语。重读文集，谨提以上数点，或有助于阅读者思考。

## 思 念

——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齐 康

杨老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我常思念着他。我不会忘记考大学时要考一张“自荐画”，当时以为只需带上水彩盒画张理想的画就可以的了，结果是要一群学生围着一个罐子画静物写生。当时我穿了一双大皮鞋，拿了块大画板，杨老，李老和其他老师在我们周围巡视，幸好我中学有过这种练习，不久被告知已经录取了。

进中大建筑系真是高兴，我们这一届的学习，杨老、童老（童寯）、刘老（刘敦桢），还有李老（李汝华）、徐、刘光华老师等等都在教学第一线，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教学班子，三年之中受到他们的教诲，熏陶，真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了。

杨老不仅教我们的设计初步，还教我们班的素描，是用一个建筑师的视角来教授绘画。他在指导“构图练习”时，曾仔细改了我的画，还画上了配景。素描的教学是十分严格的，要训练我们线条的组合与实体空间的关系，要注意光影明暗和尺寸比例。他耐心细致，包括如何用笔画配景，都一一进行示范，那会儿政治运动多，学习时间受到影响，但学习基本功仍然是得到保证。

毕业后留校的教师很少，我当助教只是作辅导，偶而进课堂帮助低班改图，他常常站在我的背后看我改设计，我有些紧张，他平和地说：“不要急，慢慢来。”建筑系要担任工民建部分建筑学的课，他大胆要我去任课。他说：“没有教师了，你放大胆子去。”1953年这是我最早独立上课的一年。

我第一次参加工程——现南京大学的东南大楼、西南大楼的设计，那是一座新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转换。他总对我说：要勤于下工地，和老师傅多商量。教育我怎样在现场直接与工人对话，这对我一生参加工程实践起了启蒙的作用，使我懂得了工程设计的“把握”和“操作”，特别是古典样式的转换，他叫我到他设计的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去测绘，努力争取学习和工作的主动性。在他的启示下，我在专业上勤于观察，勤于作画，勤于动手，深深感到一位建筑师的主观能动作用非常重要。每次跟随他改低班图时，我总是站着看，至到交图。他那一笔笔耐心地指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言传身教的老师，有次我辅导错了，他耐心地说：“如果我改图，就这样画。”所以当时我就注意收集杨老改图的草

稿，并装订成一本，可惜，经过了文革运动，草图已无踪影。

杨老做事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慌不忙地达到目的，他常讲他做学生时的故事，讲他的老师保尔·克芮（Paul. Cret），他那时师生情谊深。他总说，循序地按着老师要求去做，一步步地入门，这样可以主动从老师处学到许许多多。他改图那么细致、认真，几乎每一张图就是一张铅笔画。他十分注重比例陪衬，拿尺子，按比例画个人，因为人是衡量建筑的尺度，又是环境的尺度。几十年过去了，他的教学方法，总是以身作则，勤于改图，指点迷津。他说：我学习不开夜车，夜车开多了有损身体。

可是在1976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筑方案设计时，在他的指导下我画了设计方案，当我画好了稿子，他看到我很累，身体又不好，他说：“你去睡吧！”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图上的配景全画好了，我很激动，一个从不开夜车的老师开了一次夜车，他是我的好老师。我想起散文名作《少年笔耕》，他这是老年笔耕。他的一言一行，凝重的话语和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文革时，他受到极其不公正的侮辱，我们一批老师被认为“右倾翻案”，跪在系大门口。他坦然处之，但他关心的是工宣队、军宣队要取消建筑系，他悄悄地对我说：“真要取消建筑系吗？”他关心着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建筑学！待到建设总局通知我去开会要恢复建筑学时，他才放心。造反派要他画工厂的图，他仍是一笔笔认真地画好。在困惑的年代里，他仍然努力行进着。

“文革”后，教育部批准成立研究所。我因文革时身体、精神受到影响，我对老师说：“我再也不做行政工作了，留我当个秘书吧！”他答应了我，这使我在他晚年最后的五年中在工作、学习上有了个极好的机遇。所里花了近六年时间整理了三老的论文集和作品集。在杨永生同志提示下我开始了“杨廷宝谈建筑”的记述。那时他当上了副省长，但我们出去调研总在一起，朝夕相处，他要我们很好地学外语，做工程，他还亲自画图、下工地，带着大家，学习进取。繁重的行政工作使他劳累而困苦，他对我说：“齐康！我还想走几步！”但最后摔倒前他登上三楼已很吃力了。

由于他的行政职位，增加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他到

处讲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他爱护古迹，处处劝导，他爱护绿化，总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武夷山景区建筑的设计他是总指导，从未停止过对城乡建设中的错误的批评。在武夷山景区他亲自选择桥位，他始终在建设的第一线，来到山区，总和大家一起议论，对不好的行为提出规劝和批评，他安静的思索，带来了不平静的震荡。他说，我不愿看到现代城市，但愿在景区给我一个住所。他预感到建设性的破坏会给城乡建设带来损害。

他最后一次从合肥归来，在火车上突然对我说：“过去历代王朝，总是因腐败而告终，为什么后来的王朝还要走这条路？”他在政治上敏感地意识到廉政的重要性，他热爱着养育他的祖国和事业。

他很关心我，记得一次在武夷山考察时，我在一个草堆里画写生画，他和当地官员已向前走了百米远了，当他发现我不在时，马上回头来找我。他关心我们年轻人身体的成长，学术的进步。

他劳累极了，但仍不忘工作上的需要。一次他要求出差上海，上海的干部看到他下火车来都十分惊奇。有几次他边看图纸边打瞌睡，精力是有限的，但他的工作却没有终止。

他待人平和，与人为善，关心百姓的生活，每次单位来接他，他总问清驾驶员的姓名，下车时总讲：“谢谢你，辛苦了！”

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话语和他高大的身影常在我的思念中。

思念激励我继续努力工作；思念鼓励我认真地学习。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做事太认真了，那是对的，但要多听、多分析才能客观。人生难得糊涂，又难得认真做出成绩。”又说：“事情知道多是好事，但归根结蒂要有认识。”

杨老离开了我们，我们一代人在党、政治的领导下，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一些成绩，这一切应归人民和党，也应归功于老师们的教诲。

思念常提醒我是受到老师平时的教育，才使我能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祖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我们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老师的学风仍需我们继承和发扬。

纪念老师最重要的是提示我们要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教育人的任务在跨世纪中比什么都重要，提高学生的素质是永恒的任务。

敬爱的老师，我常思念您，虽然 20 年后我们已进入老年，但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踏着你们的脚步，再继续向前进，一定会把学生带好。

一代宗师的学术、工作成就，永远和学术精神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的是境界，在建筑上这个境界不但是功能的，艺术的，还是技术的，但更高的境界就是建筑文化的高山，是民族建筑文化的、地区的、国家的文化的高山，它是永恒的，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20 年了，我依然感到杨老仍然生活在我们的中间，他仍在审阅我们的设计、论文，他仍和我们一起上工地，他仍和我们一起切磋议论，他是一位近代建筑师中的巨人。

## 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

—— 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齐 康

今年是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想先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

20年前，我和郭湖生同志曾为《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一书撰写了前言，十易其稿，而今天在祖国大踏步前进之中，在自身学术和设计实践的进步中再反思杨廷宝的建筑学术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出生于1901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为中学校长，受到革命进步的思想影响。他读过私塾，1915年被选拔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继而又受到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清华期间学校正在建清华大礼堂，他到庄俊先生的工地图房看图，又受到美国老教师斯塔女士绘画的熏陶，所以在1921年赴美留学时决心学习建筑。可以认为传统的、开放的社会教育思想和影响都在他的思想意识之中潜移默化，杨老读过四书五经，又学习了进步文化，不能不说在他身上印下了双重烙印。他幼小丧母，自小受父亲的教诲，为人朴实求进。他在学习上主动刻苦，跳班又给了他超越的锻炼。在清华时与闻一多等人在党校举办绘画学习组，有着优良的审美意识，可以设想他的青年时代既有踏实、循序渐进的求学作风，又有卓越的美术和业务才能。斯塔女士曾劝其学美术，为他学建筑而遗憾。杨老虽未能如其愿，但师生深厚的情谊留在他的心底。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的教育、经历、性格不能不说对他日后的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踏实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既循序又超越是他稳中求进、传统更新的思想基础，可以概括为纯朴而踏实。这奠定了他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模式。

去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是他的志趣。他的建筑设计和水彩画得到保尔·克芮和瓦尔特·道森的指导。保尔·克芮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在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建筑师。保尔·克芮曾在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 Beaux-Arts）学习和任教，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服兵役。他的听觉受到战争炮火的影响。杨廷宝的主动学习、刻苦钻研的求学精神深得老师的赏识。杨廷宝学习是优异的，多次获得全美建筑系学习设计竞赛的优胜奖。他曾自述道：“当时许多美国孩子都不用功，设计题目发下后，常

出去玩，有的很不用功，就要我为他们做草图并帮助设计。当老师为他们一个个改图时，我就站在边上，老师改他们的图就等于改我的图。这样对我来说，做一个设计就等于做了几个设计。”又说：“我总按老师的要求，一步步按时交草稿。我从不开夜车赶图，养成了我不开夜车、循序学习的习惯。”青年时代学习上的争取主动成为一种求知的习惯，这种主动出自于勤奋，出自于对专业的爱好和钻研。所以在古典建筑的研究如比例、尺度、陪衬、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局部与细部的关系各方面得到了一种整体的训练。他具有一种造诣很深的古典基础训练，使他得以掌握和融汇建筑设计的步骤和方法。这种整体和本体，使其获得一种建筑美学的内在精髓。

我们知道人类的建筑审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经受教育和训练，人类对建筑美的审视是几千年人类文化的结晶。建筑受到技术、安全、适用的影响，而审美却融贯其中。这种有形、无形的影响是一种融贯、融合，更是一种贯通。建筑的功能、技术、材料虽然在变迁，一种无形精神却寓于其中。环境的建筑美、自然的风景美，都是一种内在力的反映，人们都能从物质中获取美的感觉和感应。杨廷宝说：“人不能生而知之，可以感觉和感应，要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要有刻苦的训练和自己的判断。美不只是外表，更重要是内在的。”又说：“美的训练是可以适应的，一种心、手、物的结合”。总之要训练自己有一种建筑美的心灵和能表达的手。

杨廷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他的老师留他在事务所工作。这一段时间的工程实践对他的基本功的实践十分有用。杨廷宝说：“当时老师要我留下，协助他做一座纪念馆的施工图，在做到大门铁件时，老师要我一定到工艺加工的工场去实地观察、了解。这对我画施工图十分有用，使我知道铁件制作的全过程，什么样的画法可以成形，什么又是不可成形的，也使我知道了建筑工程工艺加工的重要性。这种锻炼使我一生也难忘，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家工艺加工场名为 Samul Yalon。”留在老师事务所工作，在保尔·克芮的指导下从党校到事务所直至工地，使他获得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实践就成为他从过程中学习建筑的起点。

1926年离美赴欧洲考察建筑，他作了大量的水彩画，

准确描绘建筑对象，表现光影色彩，对西方建筑特别是古典建筑有着更深更具体的形象把握。他的水彩画是十分优秀的，不只是一位建筑师的作画，而且是一种美术家对建筑美的欣赏。70年代末在出版他的水彩画集时，挑选画页的著名画家邵宇曾夸奖说：“没有想到在建筑界有这么一位优秀杰出的画家。”我想至今建筑界也少有建筑画超越他和童寯老师建筑水彩的水平。他持续作画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在回忆中说：“我们的时代正是从新古典转向现代新建筑，就是我的老师的作品也随着时代转换。”这说明一位建筑师的作品，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是一步步的转换，他曾说过：“在这转换的时代两种建筑形式的‘搭接’正是我从事建筑设计进程中经历的过程。”从新古典至现代，他亲眼并从实践中看到这过程，从他实践的身影中深感转换是一种职业建筑师必备的思想和手段，以适应当时各种业主、各种建筑性质的需求。建筑师的职业是要在时代建筑形式转换和变迁中去适应、去创造和创新。

1927年他回国投入到中国土地上的建筑设计中，他的职业活动发生了一种巨大的变更。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建筑观，在分析建筑作品时，必须将建筑的进程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上来分析。杨廷宝回国从事建筑设计事业是自1927年加入基泰工程司开始的。应当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建筑事务所之一，当然往后还有庄俊、沈理源、范文照、董大酉、赵深、陈植、童寯（后三人合作华盖建筑事务所）、徐敬直、李惠伯等事务所，他们的工作和活动，构成中国近代建筑设计活动的重要内容。基泰工程司以关颂声为首，朱彬、杨廷宝、杨宽麟参与建筑事务（其后梁衍、张镛等人也参加一段时间），杨廷宝是建筑设计主要负责人。但是他们处的是解放前的旧中国时代，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贫穷落后，广大地区仍为农业社会，仅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几个城市有一定规模的建设，但也是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统治者手中，许许多多的建筑设计被外国人垄断。他们一批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出色地设计了一批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开创了近代中国建筑设计事业和建筑活动，从而打破了外国人对这一领域的垄断。他们是当代建筑师的开路者。早

期建筑师当中，最早崛起的代表人物要数吕彦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南京中山陵，至今可视划时代的杰作，是一种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可惜他不幸英年早逝。接下来是一批20年代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师，他们继续开拓和探索。杨廷宝就是这批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一位，成绩卓著，驰誉当世，五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建筑设计活动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设计作品逾百件。

基泰的建筑活动接触统治阶级的上层，有较多的实践机遇，所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进程，这是时代给予的历史地位。

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活动，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离不开他所经历的学习和工程实践，更离不开同代人。杨廷宝的同代人均受到海内外建筑风俗的影响，观察杨廷宝的一生，他的设计无不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中，在所受到的制约中，做出了杰出的优秀作品。在解放前受到外来建筑文化的禁锢，解放后的初期又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即使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他仍然作出了设计的最强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学习经历来分析，他自幼接受过传统文化，继而受到西方建筑教育及文化的影响，再经过国外和中国的建筑设计实践，有深厚的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基础。一条从新古典到新建筑的历程。

从建筑设计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解放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泰工程司依附于上层社会，有机遇得到众多的公共建筑和小住宅、学校的设计实践。解放后的前30年，虽然建设量不大，他参与并指导国家级、省级的重大工程，并不断地参与建筑设计实践的活动。实践活动及理论的认识是他的学术主线。

从创作的实践分析，在解放前，他和同辈人共同开创设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是当时设计界的佼佼者，是位优秀的建筑大师和宗师。

在建筑教育的生涯中，他十分务实地强调整体的建筑认识、过程的教育、建筑本体的感应和感悟，培养了一大批建筑设计和理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建筑设计和理论的骨干力量都是他和一代先辈培养出来的，桃李满天下誉祖国大地。

从他的建筑活动来分析，他担任过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代表国家出席过各种有关建筑的国际会议，站在民主、正义的立场，为伟大祖国取得了荣誉。

为此我们在 1981 年编撰的《杨廷宝建筑作品集》的前言中，开场白的首句提以“披荆斩棘开拓路径，才知前进之艰难。长期从事建筑创作于复杂境遇之中，才能领悟成功的困苦”。20 年过去，回首当年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杨廷宝老师为人诚恳、朴实、谦逊、勤奋。他的待人接物，对社会的理解，对学生教育循循善诱都是出自内心的爱护。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党，一如既往，始终不渝。他关心国家大事，无私的奉献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历史的阅历，多少次历史的教训，使他认识到，要发展建筑事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副省长之职。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是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辞辛劳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的工作精神是做到老、学到老，行进在建筑设计活动在世纪行程上，直至去世之前三个月仍在工地上指导工程设计，实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他的这种精神，永远体现着榜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建筑师培育中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他晚年的心情是“沉寂”和“远见”，由于城市的发展，他特别关心注重环境的城市规划，关心城市建设。

他十分热爱大自然的环境和风景，对武夷山风景区建设提出了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要向民间乡土建筑风格研究学习，推陈出新。他曾说：“你能住在、生活在这自然中该多好。”他爱护大地上的一树一木，见到地方建宾馆，他总要求保护树木。他批评破坏自然林木的管理者，在选择桥位时总是让开景点，保护山林。他尤其关心古建筑历史文物的保护，他提醒当地的一些官员要保护古建筑和文物。每到一处参观古建筑群、寺庙、碑刻，他总默默地说，这是中国大地的文化呀，是历史的见证。一种历史的语言来看待今日的世界。他最后一次和我对话说：“历代皇朝，一代代的灭亡和改朝，为什么后代不吸取前朝的教训。”这次对话使我震惊和感动，他从小处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他厌恶地方官员的大

吃大喝，厌恶请客送礼，弄虚作假。一次从某地归来，送至他家门，他拿出一盒绿豆糕对我说“齐康，这盒绿豆糕，要不要上交？”再有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安排住套间，他说请领导换个双人间，我们住在一起，这样房价可以低一点。他那种廉洁奉公的精神印刻在我心中。不浮夸，不宣扬，总默默地做着 he 应做的工作。他待人以礼，凡来请他改图和请教学术见解，总平和待人，拿起纸张为人改图，务实地解决问题。他告诫我：“事情知道多是好事，但要成为自己的见识，处事过细是好事，但要辨别事务的两面。”他辩证地看待一切，宁静以思远，谨慎以行事。他总虚怀若谷地探求新生的事物，但对追求形式、不务实际，造成无谓的浪费表示不满。他在评价他同辈人及世界级大师时，既肯定一面，又指出他们的不足。他对赖特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美国本土文化中的创新，是空间组合的天才，是处理建筑与自然的能人。赖特的创新风格，使他从心底里佩服，但对他那 Johnson 制蜡公司的一把把大伞经常漏雨的事，他笑着说：“这叫怎么走，人少可以，人多了是多余的，局部可以，可不能用到大处。”我到南加州大学，看过赖特设计的小会堂的斜楼梯，确实不便。杨老对建筑观察十分细微，并注重人的活动，他说：“纽约古根海姆旋转展览馆，自上而下叫人一脚长一脚短地走，这样好吗？”他敬仰人，但又保持自己的看法。他对南京中山陵的牌坊认为有创新。但又不地道，陵前的华表没有必要放在两侧，古代有自己的章法，章法要因势利导。他评价中山陵与明孝陵，有自己的见解。明孝陵从下马碑开始因势利导，因地形而曲折自然，从下马碑到四方城一直延伸至明孝陵的甬道，对地形运用得那么自然，具有深远的皇气，可惜建中山陵时将它断掉，现在已破坏殆尽，他为之遗憾。中山陵虽然有气魄却在一个暴露无余的大台阶上，而将碑亭放在中央。中山陵形似钟的总平面，一览无余，壁山而建，而吕彦直将西方的新古典加以中国古典屋顶手法的更新，那又非常了不起。时代变迁了，巨大的雪松掩盖了它，自然把中山陵衬托出来，又回归了自然。他常说自然是个融和剂，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他拜访过勒·柯布西耶事务所，他说：“柯布了不起，但不能用一种模式到处套，脚腿空透是好，但不宜处处使用”。

从他的发言中，他总是如实而辩证地看待国内外的同一代人。

至于对他的国内同一代人，他总是平和地处理各种矛盾。他在谈论时会提到他们的优点，他说：“童老和我是亲密的朋友，我们各为其主，从不谈生意上的事，但常常在周末约好一起郊游。童老步测他的园林（即江南园林志），我总勾画那园林风景。”他常告诫我们青年人学习建筑知识非常重要，平时对砖、瓦、石、柱等建筑构件非常注意，并将防水看得很重。他来到古建筑现场时，总要察看一下贴着墙的透气洞，注意中国木柱的保护，看到屋檐总要看出檐深远与下面台基的大小。采光、通风、透气、防漏等措施在工程设计中，一点也不能疏忽，真是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他的这些熏陶使我常背尺寸、背比例陪衬的关系，他深深地意识到建筑及其群体大尺度把握的重要性，他说“我和梁思成先生在翻译 Proportion 这一词时反复推敲”他们认为翻成“比例陪衬”为宜。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沿用这个词，在日后的工程中，不论是新设计或改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个建筑师能否把握，能否在实践中操作，那是长期工程实践中的积累，是把人们的劳动、建设的结果用眼来观察。我想任何设计的天才如若没有实践，特别是实践的全过程，仍是走不到完美的境地的。虽是我们已进入计算机时代，但毕竟是辅助的。若无人脑创造性的思维，没有实践的认识和情感的感悟是难以整体完成设计任务的。

他在设计工作中非常注意团队的作用，他说：“当我接到任务，首先观察建筑所处的环境、地面的大小、地貌的现有物和树木，吃透了环境，随即比划我的构思。我总和杨宽龄工程师，研讨结构方式的结合，建筑不仅可靠而且取得合理性。我总在功能布置时想到人们的适用和方便，然后再动手，我绝不先想个形式，再去凑……。”这些我将在以后的归纳中来论述。

由于他有众多的实践和经验，他对问题的分析和实施的可能总不说死，给学生们的概念总是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年青时代不甚理解，随着自身工程实践经验的增多，渐渐地认识到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总有各种可能，我们的责任总是择优而行。在工地上修正自己设计中和施

工中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工地上的改图更为重要。他面对现实，一点也不马虎。我常碰到一些朋友对他们的设计说“只要做到见到大体外形，能否继续那是以后的事，反正我又看不见”，这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行为比比皆是，缺乏精益求精的责任，对青年人那是特别可怕的。于是我也常常说“不下工地不是位好建筑师”。设计质量的低劣，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建筑寿命的缩短，更是一种无形的损失。

杨廷宝在他的设计中，不论是小住宅，抑或是公共建筑，非常注重建筑的环境。他的自宅（成贤小筑）设计就保持了原有的基础，利用有限的空间环境节约了投资，又与周围的林木相结合。和平宾馆的设计注重周围环境的四合院，又获得最大的效益。又如对待东南大学校园的改建和更新，他强调了大礼堂前建筑高度的限制和统一。他身体力行，30年代连接图书馆的两翼和中大院及大礼堂三座建筑的两翼，甚至在清华大学原图书馆的拼接中，都组织得天衣无缝，十分得体。他说：“一位建筑师在历史环境中做设计，不只是一要适配环境，而要求得风格上的一致性。”四座建筑的连接处在四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功能要求，风格上传承和转化，取得了协调与统一。他做到此时此地此情，又达到彼时彼地彼情。经济条件的不同，工程的时间要求及业主要求，建筑师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如何对待社会的经济、最后如何最大地对待人民的利益的问题。不只是近期的利益，而是长远的利益。建筑师的灵魂应当是在人民的心中，建筑师的心应当装着人民。我们讲人本，我们讲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来讲是怎样将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和人民的需要。

从杨廷宝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设计使他得到平衡，他所作的成功的建筑设计，使他获得心理平衡，也有许许多多是与社会的机制不能合拍和不平衡的地方。特别他晚年来到武夷山，他对我说：“能在平静优雅的风景区给我一席之地让我住下来，城市我不想见。”说实在，他在世界城市与建筑的发展中，在城市与建筑的诸矛盾中看到了建筑的反面效应。他在病床上还说：“天天高论历史建筑古迹的保护，却不时在看到、听到古建古迹被人为地破坏。”他深深地意识到不良设计的

建筑带来的负面效应。他喜悦地迎接着建筑科技发展的春天，也同时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他心地里充满着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情感，也不免带上焦虑。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他的情感。一次在北京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玉渊潭去画写生，他说：“好”。我说我 25 岁在那儿写生，那儿多么的野趣，那么的宁静，水中拔起的大树，那倒影多么奇丽，那光影多么光彩。但一下公共汽车，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内疚地画了几棵树，杨老异常地沉默，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他淡淡地说：“我们回去吧。”杨老总是那么地平和慈祥，有一年来到曲阜阙里宾舍，他轻轻地对我说，这样一个环境，也只能这样设计。他评价之余，内心总是在揣摩。在曲阜带实习，天是那么的炎热，他和我们一起到河沟里去洗澡，好凉爽啊！大家把衣服脱光，洗澡显出了人的本体形象，那么平易，那么近人。在 1963 年，中国建筑代表团到古巴访问，他西装革履，精神矍铄，他那风度，真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建筑师，这又是一种人的本体，一种中国人民的精神本体。人是需要精神的，这精神是真实，内在精神的本体是一种象征。他反对新街口建高层，他深知一幢高层会带来无数的高层，他不出席这类的会议。但一次从镇江回来，家门口已等着市里的车子，我们一起被“押”进市府的会议室。记者、摄影师的镜头拍个不停，闪闪的光亮，照耀着他内心的“无言”。人生常会碰到这种违心的境遇。事物的发展总是矛盾的，这也就是历史。

和杨老晚年共渡的五年，深受他的教诲。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无形言语，他正确对待了文革的“屈辱”，他挺过来了。在十年艰难岁月中，工宣队要取消建筑系，他轻轻对我说：“不能这样下去。”我深知杨老、童老内心的痛苦，知识分子的身心已被严重地挫伤，有形无形地摧残着他们。一生热爱的事业停滞，人际的矛盾，触及着他们的心灵。杨老对我说：“我还要走几步。”他有着他事业的最终理想。在研究所成立的那天，会议刚开始，他对大家说“会议慢点开，等一会。”不一会儿童老被他请上来了，他对童老和大家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研究所成立的前六年开始系统地整理他们的一生成果。他对我们说：“要看书，要实地调查，要从事设计，要总结经验。”省里任命他为副省长实在难为了他，他要

面对一批行政事务、接待外宾、发奖状、视察……他步履艰难地登上三楼，他对我说：“我身不由己……。”于是他口述了“杨廷宝谈建筑”。我跟随他到有关地方考察，查有关资料整理他的最后嘱咐。他离开了他热爱、从未离开过的建筑事业，离开了祖国和亲爱的人世。

我较粗略地阐述杨廷宝老师的一生，目的是为了探讨这位建筑界一代宗师奋斗的一生，他的背景和历程。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归纳我又五易其稿，试图概括他的一生，作为一种纪念他的学术哲理探讨，为后来者带来一个启示。

一、实践是建筑设计的基本，是建筑教育的重要环节。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学习，不断地总结和提炼。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和建筑师职业基本训练相结合。

杨廷宝先生八十二岁逝世，过早离开了世界。他一生最可贵的经验，不论历史沧海的变迁，作为人类伟大文明的活动——建筑，他坚信营建城市和建筑群，要做出优秀的精品，造福于后代是他追求的宗旨。从职业的行为来剖析，建筑设计工作长达 50 年之久，不论毕业后在保尔·克芮老师身边的工程设计，那是追求建筑本身的设计，艺术造型设计，还是三十年代的实践，抑或战争年代，他都从未停止过他的职业活动。基泰工程司的建筑活动起始于天津、沈阳，尔后至上海、南京一带，甚至重庆等地，都在政治活动中心和较发达经济地区，这是由于建筑具有社会营建活动较多的经济条件。40 年代开始他的建筑教育活动，先是兼职，后是专职。在四川重庆沙坪坝，在艰难困苦年代里，他坚持了教学活动，他和童寯，刘敦桢等先生，特别在鲍鼎先生的主持下形成了培养学习建筑的兴盛期，我们称“沙坪坝时期”，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人才。他勤于动手、勤于实践的精神在一代代建筑师的培养中被视为典范，一种踏实、务实的作风，不空谈，十分强调建筑的功能和适用是实践的最重要的标准。他绝不是画几张图以自我陶醉为目的，常年在工地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不以“讲建筑为建筑”，不以“画建筑为建筑”，而是“多做建筑”的实际，这是一根红线。图纸是实施前奏，从图到物是要有实际上的经验判断，任何设计、创新离不开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指导。理

论的重要部分是人类实践的结晶。他在教学中注重实践活动、研究人的尺度，在大门框下总画一个人，以人为本为尺度，他说：“有两样东西的尺度应严格遵守，一是踏步，另一是栏杆的高度。”这是建筑尺度以人为本的最具体的起点。他十分重视层高的高低，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性。建筑之于环境之中存在一种环境的尺度的问题。他开玩笑对我说：“别看和尚庙，那方丈和尚在建设中也度量山门和其他的方位和尺度呢，有时还不断地修改”。60年代初经济困难，建设量很少。他要我们参加一些建筑讨论会，听听、看看别人的设计也增长我们的知识，就是你建一幢厕所也不容易，厕所要排除臭气，人工掏粪，冬天不受冷风，做好也不容易。就这样他教育学生“处处留心皆学问”，观察社会的经济、社会、科技活动，要学生勤于记载，勤于用一根小钢尺来度量建筑的各个部位。我想我们已进入计算机辅助设计时代，人的感觉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实践，人不可能事事实践，但经验的实践和提炼、学习前人、学习同辈，那是多么的重要。虚拟的、虚幻的是以实践中人的认识为基本，实践过程中不只是设计一幢建筑和一个建筑群，而是营造一种人居环境的情感，情感促使智慧的产生。实践可以从人的活动中、在实际操作中、实体的建筑及其艺术表现中带来情感，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书本的学习非常重要，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是非常可贵的。杨老厌恶空谈，不着边际的空谈，但又十分注重宏观的理论和指导，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他着力于“控制”和“把握”的研究。建筑师的能力在于“控制”和“把握”。我们从无限中“把握”那有限，从有限中获取“控制”。我们的认识可以跨越，但行为要制宜的“把握”，一步也不能松懈。学术的研究是创造的原动力，但心灵的感悟又来自实践，一种辩证、科学、历史的思考。

杨廷宝在实践活动中重视设计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二者互动互为因果。他对我说：“你喜欢抄图是好的，那是从图到图，但观察实物，对起号来那才更加重要。”他对实践也是批判的态度，他常进图书馆看书和杂志，他对我说：“不要被杂志上那新奇古怪的东西所迷惑，杂志上有的编辑总喜欢登载一些有刺激、新奇的建筑形式。”他还说：“城市大量的建筑和群体是

普通的、普遍的。我们着眼点不只是几幢标志性的，更要看到面广量大住宅及其群体。新奇的、时髦的有时是一种误导。”我们勇于探索，那是一种前进，是值得鼓励，但寻求其普遍性，那更难能而可贵，从他实践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体和本体”的建筑观。

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从国情出发，依据地区、时间的社会与经济、技术的状况做出合理的设计，一种地区的制宜。

杨廷宝留学美国，回国前去欧洲旅行。解放前后，特别是担任世界建协副主席后，考察了世界许许多多的建筑，从古典到现代建筑，他深知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建筑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差异，他也深知中国建筑随着地区的不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建筑设计一定要结合国情、省情。在长期的实践中，做出切合实际的建筑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也必须深知业主和使用者的要求，建筑外部内部的变化和变迁。他说：“我设计过近百幢建筑，几乎没有一幢建筑在实施和使用过程中没有变动和改动。建筑的功能和性质始终是设计的基本。他在基泰工程司的工作中，有一段时间是修缮古建筑，如北京天坛、国子监等著名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和匠人们切磋工程知识，了解古建修缮中匠人的口诀。他知道建筑的社会性、经济性和技术性。解放前后，他做过各种类型的建筑，如小住宅、医院、体育馆和体育场、纪念性的陵墓和纪念建筑、大学的教学楼和图书馆等等多种类型。国情、省情、社会的经济投入状况、业主的意图和建筑师的关系直接、间接地影响建筑的设计。他做过高标准的小住宅，也做过公务员使用的住宅，既有昂贵的用材，也有以竹篾为筋，粉上黄泥和石灰作外墙的简易建筑，因时因地的运用建筑设计的技术和技法。他观察细致入微，一次在故宫作画时他说：“你看当时的总管，总是把最优秀的匠人用在最重要的建筑上，而后宫的一些次要建筑不论在建筑群体上，还是在组织上，就差一点了，匠人的水平决定建筑的优劣。”他又说：“同是一个歇山屋顶，中轴线上与两侧的就有差异，我们讲法式，很少有匠人用法式来建，都是由领班师傅来指点，建筑匠人的口诀，代代相传，法式只是一个总结。”他又说：“避暑山庄的入口，雍正年间先修，尺度都比较小，帝王们深知建筑的银

两多少有关国力。”在实践中他深知经济对建筑的重要性。1953 年在北京修建和平宾馆时，他注重了建筑环境，采用现代的手法。不少人说这建筑是受密斯的影响，又说是受到某种流派的影响。正好那时批判大屋顶，我问他：“您的设计思想究竟来源于何处？”他淡淡地说：“当时周总理交给我这任务，是要快，要节约，要在短短的时间里，解决当时亚太和平会议的需要，遵循对速度和经济的要求，我没什么这个思想，那个主义。”这是深知开国期间建筑设计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件事得到周总理和建筑师们的赞赏，他并未想到以此来表现建筑师的个人，更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需求。北京刮起了大屋顶之风，当时在南京的高校也建了几幢，他对我说：“一定要简化檐下部，采用额枋、托梁来处理。”以简化的手法来适应建筑环境的需求。南京大学的东南楼和西南楼几乎同时修建，采用了简化大屋顶。他在南京工学院五四楼的设计中更采用了简化设计，至于设计的动力楼，是一座比例合理的现代建筑。他十分注重经济和造价，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求。我们讲国情、省情的地区建筑，最大限度的想到经济投入的程度，他的“把握”和“控制”是十分得体的。从建筑的修建来说，还有着时间、空间的因素和地区工程技术的水平。国情有地区的差异、有社会和经济的状况、有地段的特点，有建筑的性质和实施的可能。地区主义的核心，那就是制宜，我看没有比因时因地制宜更重要的事。再有就是建筑文化的上层建筑，杨廷宝说：“时间的协调将建筑永远融和在大自然和城市之中。”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的设计，造价是十分有限的，他利用地形，周围回廊的花坛，他用了经济适用的斩假石，他说：“斩假石，施工技术好，经过岁月可以达到石砌的艺术感觉。”修建谭延闿墓时，他采用北京被破坏的公主坟的华表，将它搬来“装配”在墓前。他因势利导地根据地形、水流、树木组织一种自然的空间序列，并获得了成功。他反对用“丁字尺”、“三角板”来做规划，而注重结合地形修建道路和建筑，因势而利导。

### 三、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探索建筑文化的传承、转换和创新。

杨廷宝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新古典主义向新建筑的转换时期，他说：“连我的老师也不得不向新建

筑转。”但回到国内正碰上一种“国粹精神”的复古，在这种交汇中可以看到他建筑风格有了一种时代的变化，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成为一种风格上的抉择。从他的设计过程来分析，虽然依照业主要求，但也看出他设计的多样性，他那熟练的技巧既符合当时业主要求，同时产生一种中国传统的新风格，如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他仿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摩尼殿，又创新地将大会议室和办公楼做成一种对称中的不对称，将传统建筑结合得非常自然和得体。他大胆设计的建筑有现在南京中山东路的档案馆和陈列馆，又称东宫、西宫。同样采用大屋顶的方式，但他摒弃了传统檐下复杂的斗栱。他在风格上传承的转换是合乎逻辑的简化，一种新的中国风格的手法。他常说：“古典的比例，现代的手法，是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现代建筑。”南京延晖馆的设计就设计得那么现代，至今看来也不落俗套，完全是现代建筑的创新。沈阳老火车站，它大胆地将传统欧洲车站现代化了，用了车站的符号，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形式。同样在南京老火车站（下关），也是用拱形来作车站的标志。我们从它的作品系列看出他设计的踪影，他的运作轨迹，从起始阶段带进美国现代的新古典直到延晖馆以及和平宾馆的现代建筑，虽然是业主要求，他还是把握建筑时代进程的脉络。他求实的作风，达到了多样而统一。他没有哗众取宠，看得出他强调以功能为基本的设计思想，形式的变化是表象但如实反映了功能的要求，他把握住了而又有超越。他的前进是稳中求进，一种有理有节的跨越和前进。这也是他为人作风在建筑内容和形式中的反映。他的设计思想受到社会体制、制度的制约。但是他前进了。年青的建筑师看了延晖馆，也不由得惊叹他在建筑设计中的杰出成就。

传承，转换，创新首先是思想上的创新。他个人性格中的稳健也不排除他对自身风格上的“新”的探求，可惜时代给予的局限。前半生，国内战争，日寇侵略，国力衰退，民不聊生，没有研究的机遇，他的设计步履艰难。他没有路易斯·康的机遇和新建筑的大环境、大氛围，但他却不时地闪耀出创新思维的火花。时代给予设计者的制约，我们不宜苛求，我们只是从他设计思想的进程中窥视他的转换。即使微弱的、个别的也看出一代宗师的思想 and 求实创新的精神。

我常想年青人从时代的视野去分析前辈，用时代的眼光，那是科学的态度。设计的素质和精神的素质永远结合在一起，设计的心灵永远以现实为基础感应拥抱在一起。正确对待我们的前辈才能正确对待自己。人的一生那么短暂，老一辈经过、跨越的时代不同，艰难困苦不同，他们前进的每一步与我们今天社会的创新有许多本质性的不同。适时的、务实地评价前辈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和崇敬，我们需要有这种治学态度。

四、将建筑看成是社会人的建筑，辩证地对待建筑事物的变化，了解实施过程又注重其结果。

杨廷宝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他看到了旧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他看到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他对我们说：“我在国外学习，或在欧洲旅行，一些外国人总鄙视我们，总说着‘秦’‘秦’现在翻身了。”他那热爱祖国的心情可想而知，解放时，他可以离开大陆，他却毅然留下执教。时代不同了，建筑是为人服务，这个“人”是有社会人的属性，是有阶层和阶级，是有富有和贫困。我们讲以人为本，即是一种人本的思想，最大利益的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一种时代的需求。在武夷山景区作画，在中山堂边上有一幢十分破旧的小学校，课桌椅零乱而破烂，屋顶是漏水的，小学老师没有备课的条件，有时只能站在廊檐下，听着小孩子们读书，书声朗朗，我们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小学校长知道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向他反映，要求只是把修武夷山景点的“下脚料”来修补这座学校的校舍，对此事他让我即刻反映，不但修好了教室，后来由赖聚奎同志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学校，并由地方政府出钱建造，他关怀着人民。建筑的属性是为人，为社会服务，可惜他未见到这座新校的建成。

建筑有着众多条件的制约，它受到经济、业主、投资、施工、使用者、土地和必要的设施的影响，在城市和建筑营建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变化，绝不是单凭建筑师个人的设想，观念去解决。杨廷宝在长期实践中深深懂得这种变化的脉络。要从诸多复杂的矛盾中去寻求科学、合理的设计途径。凡看到甲方、设计者来请教，他总默默地沉思，他很少口头上去回答，而总是拿张透明纸亲自改图，探讨可能性，总

是“你们试试看”，他亲切和蔼的面容，感人肺腑，他总是把客人从办公室一直送到大门口。他深知人的交往是一种友谊和友善，表现在图纸是一种情感和情谊。但他对不理想的设计或做法，又是那么坚决否定。深感建筑师的素养多么重要，在诸多的变化中探索，拿出自己的主见和观点。事前事后的对比，一位建筑师要有时代的观念，要跨越，要预见许多事，这时以为是对的，时隔多少年后又为之惋惜和遗憾。人们常说建筑艺术是个遗憾的艺术，因为一旦建成难以修改，实施过程中的把握多么紧要，过程中的修正为的是结果，结果反映的是社会的建筑，城市的建筑，它连续几十年，上百年。我们要有预测，预测从哪里来，从书本中来吗？从道听途说中来吗？从哗众取宠中来吗？有的建筑师只要看到它一时的形象美观，刺激人们求新的心态，获得一片“表扬声”；“获得某种大奖”。它的使用，它的命运，置之度外，这种不科学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更有甚者，一旦建成尚未使用就请专家们来“炒”，自以为炒作就成真理，却不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老的谨慎不是一种保守，而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需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常听到他讲“这也可以，那也可以”，这是他的口头语，事实上是反映建筑与人、与社会、时代的变化，一种真实地区主义建筑设计的态度。他的心态那么宁静，那么深远，是我们一代青年人学习的榜样。从他的实践经验中，使我懂得了要不断地反思，工程做得越多，越要有自己的反思。反思和检讨，不断调查自己设计过的建筑的使用、坚固、美观等等，反思、检讨使自己在设计中再取得一种进步。杨廷宝虽未写出厚厚的“大书”，虽未口若悬河地空谈理论，但他知道建筑实践的真谛。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总不平静，所以我写了一篇散文称之为“花环和套环”，设计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要求得一种新的“和谐”，“入境”老师，我在散文中写到，要亲自将那花环上的花朵，一片一片地摘下来让溪流漂走。杨廷宝的建筑思想，我们说实践是第一性的，实践中要十分注重过程，没有好的过程，怎么会有好的结果。我们追求的是将过程和结果统一起来。

五、尊重自然环境与建筑、城市的融合，尊重建筑历史、科技的发展，不断适时的提高建筑文化境界。

杨廷宝的一生，从自身的实践中意识到建筑不只是社会的建筑，也是社会人的建筑，人民的建筑，要做到这一点要十分注重“本体”和“整体”。他晚年更加关心城市的建筑和建筑环境的塑造，这样才能将建筑和城市生根在大地上，使建筑成为一个有生气的建筑，一种活的建筑，可以再发展的建筑。这个整体对于环境而言是相对的，建筑相对于室外环境和城市，而城市环境又相对于地区的城镇体系，整体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环境相对比，相协调，相融合。整体观念也就是环境的观念。整体的观念又相对于对建筑本体的认识。我们讲建筑的本体是要不断寻求建筑发展、保护，控制规律性的表现，建筑的本体是要研究建筑、建筑群与内外空间的关系，这个本体是研究人与建筑认识上、行为上、生理、心理的互动，建筑物整体和局部美学特征，更是功能适用、技术、科学的关系。本体的根本是人和建筑。美学的特征又是千百年来人类经验的总结，地区人的习惯，民俗风情的情趣对建筑的影响。所以地区、地域性的研究，从大到小、从高层次到一般都着落在建筑的本体上，特别是人与建筑的比例陪衬，建筑结构技术、材质的变化、科技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一种力的作用和反映。

我们讲存在就有意义，那么诸关系的相互作用同样具有意义，我们从意义的本质去探索其形式，从符号中寻求其变化，一种转换的思想。一部建筑史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筑意义的转换，科技的创新的变革，既是结构性的，又是内容和形式的。杨廷宝的建筑思想中重要的一条是尊重自然，尊重历史，这实质就是尊重人民，因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延续的，是可以借

鉴的。一位建筑师对自然、历史的尊重，就是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历史和自然，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一种敬业的精神，一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人类的聚居从自然而起，而又从对抗中认识到返璞归真，我们不妨把建筑的一切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力，最终要服从这大自然的规律，成为自己的行动。一位有识的建筑师要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又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以自己的职业训练，全局性认识城市和建筑，教育和普及建筑知识，使人类聚居的载体成为一种最高文化的境界。在国内外，在中国历史上曾创造出人类无比灿烂的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今天，要提醒人民重视建筑文化，境界的追求永无止境，融合、协调、制宜、适配这种思维，以哲学思辨的态度对待建筑，摒弃那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而是探求真实。杨廷宝说“大自然是调和剂”，言短意长。建设的浪潮像一层层的波浪向前推进，但那飘浮的垃圾永远会成为一种“渣滓”。

我赘言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因为一种有使命感的学术思想和活力会是永恒的。正确的思想，在漫长的建筑进程中会得到认识和发展。

今天我们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深情缅怀我们的老师和他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和教育精神，怀念他身体力行、淡薄名利地为人民服务，至诚地对待友谊和教育后代，学习他追求的制高点——人民的建筑文化。

最好的纪念是学习，最深的纪念是实践。敬爱的老师，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诲，在思想上做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踏着建筑先辈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前进的道路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困惑，我们定将克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最大的力量是宽容和团结！

## 恩泽绵长——忆杨老

钟训正

1948年刚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时，有一位深知中大建筑系情况和本人夙愿的知情者诚挚地祝贺我选择了理想的学校，最好的系。一踏入建筑系的大门，就得悉我系有悠久的历史，拥有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杨、董、刘等先生的名声响彻耳际，更得知杨老已蜚声中外。当时，杨老的若干作品作为最优秀的建筑范例，鹤立在那时的首都——南京市，也得知杨老留美时成绩出类拔萃，曾得几次大奖，给中国人扬眉吐气。杨老在学成归国赴欧考察途中所作的水彩画已达到炉火纯青、超凡脱俗的境界。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杨老的形象非常崇高，是我们的景仰对象和理想目标。回想起来，令人惊异的是那时的杨老只不过47岁，在水彩画的高峰期间也不过26岁左右，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一年龄段还几乎是一张白纸。

在我就学期间，杨老是系主任，我们私下里称他为“杨老板”；“老板”是出了名的严厉，给我们“刮胡子”（批评训斥）是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我恐怕算是“得宠者”。我们在一年级的素描课是杨老亲自教的，每次带了教具来一年级的所在地丁家桥上课，有的教具还是沉重的砖雕。当时我们野性未驯，心态浮躁，不耐心细磨慢琢，四个钟头的作业时间一个钟头就完成了，其成果的粗糙可想而知，自然就招来杨老一阵痛“刮”，说以后要加倍延长作业时间。在一年级上学期倒数第二个作业是渲染希腊Doric柱式，最难处是方帽盖对双圆鼓形体块的阴与影的转换，我们的浮躁风到了极致，有人索性给背景涂上毫不稀释的浓墨，结果全班只有两个人勉强及格。杨老当着全系同学的面（全系学生都安置在一个大图房内）对我们严加训斥，说：“如果你们马马虎虎，不想认真学习，就趁早转系”。对最后一个总结性作业——西洋古典构图渲染，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但某些方面还免不了故态复萌。我在描绘一个希腊柱式的檐部时，原图上有卷草花纹，我想偷懒不画，杨老一看倒是“刮”得很直接了当：“你想偷懒就不必学建筑了”。后来这个作业我们都很尽心尽力，态度特别认真，在接近完成时，杨老居然喜形于色，兴奋地请来董、刘等老先生，巡视一遍后说：“我看这一班将来大有希望”，久旱望云霓，久“刮”之后好不容易得来这么一句赞许的话，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鼓励，最后我班的成

绩都很不错，我得了最高成绩95分，倍增了我学习的信心。在一年级下学期第一个设计题规定以西方古典手法设计一座公园桥。当时我的创作欲望很高，面对设计的处女作，自然要发挥一番，使出了浑身解数，添这加那，意犹未尽，全然不顾古典法式的严格约束。杨老在改图时要删改的正是我呕心沥血自鸣得意的“精华”，我不肯割爱，犹作困兽之斗，弄得杨老忍无可忍，严肃批评我是在干一般泥水匠的活。杨老在教学上很务实，很注意与国情的结合以及现实的可行性。他很反对囫囵吞枣地生搬硬套国外杂志上的新时髦，对我在设计上常出现的“新潮”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杨老对我的重锤敲打，虽然有时弄得我灰头土脸，甚至使我有难以忍受的痛苦，但痛后反思，继而改正，每改必有明显的进步，使我受益匪浅。

回想求学期间，全系学生都学习和生活在一间大图房里，彼此都很熟悉，一方有事，多方支援，杨、董、刘等老先生每天都来图房，我们受教的机会特多，尽管挨“刮”的机会也多，得到的指导倒还是细心和耐心的。那时的政治运动较多，但老师的高度的责任心弥补了学习时间的不足。那时我系的学制是四年，虽然因当时祖国建设的需要而提前一年毕业，我们所受的教益倒还是颇为丰盈的。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享受了和睦大家庭的温馨，每逢元旦迎新，在盛大的师生大联欢会上，定有杨老的舞剑，或太极拳或翻筋斗，以及童老的讲笑话等等。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实在令人留恋。

杨老在国际和国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处事公正无私，决不压人之长，护己之短，坦诚待人。在矛盾重重的建筑界，都能得到各方面的拥护和爱戴。杨老的无私绝非无情，虽然在教学工作中铁面无私，平时却平易近人，对同辈很尊重，对晚辈既爱护又关心。1952年我毕业后分配至中南区，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各一年，杨老得知我学用并非一致，亲自要求高教部调我回校。当时越区调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高教部下调令到武汉大学，武大按兵不动，后来杨老在人大会上与当时的杨秀峰部长重申调动一事，高教部去电催促，终于调动成功，我满怀幸福感回到了杨老身边。1962年我参加了组建杨老的研究室，虽然那时国家经济紧缩，设